

虚拟运营商争相进军海外 出境数据漫游成产业蓝海

■ 新华社记者 高少华

中国每年有过亿的游客前往国外旅游、学习、交流,并且呈现逐年递增态势。面对数量庞大的出境人群的移动数据消费需求,国内新兴的虚拟运营商开始争相布局海外,期望能够在国际业务中抢占先机。

在近日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上海站”上,虚拟运营商“蜗牛移动”携手法国虚拟运营商 Transatel、比利时电信 BICS、芬兰 UROS 和 Exomi 等多国运营商伙伴,宣布启动 2016 全球化战略布局。

早在去年,蜗牛移动就已开启国际业务,推出了一系列国际免卡产品。经过一年的发展,迄今已覆盖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每天为上万名游客提供国际通信服务。

蜗牛移动高级总监徐崇贤表示,为了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蜗牛移动决定今年加大海外投入,进一步加速全球化战略布局。未来,蜗牛移动也将会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走出去,最终实现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全覆盖。

和蜗牛移动向出境人群推行 170 国际免卡模式不同,国内另一家虚拟运营商“263 移动通信”同样锁定全球华人移动通信服务市场,通过与近 40 家国内外运营商、终端厂商等建立生态合作伙伴关系,为用户提供出境数据漫游服务。目前漫游平台每年承载运营商用户超过 1500 万,即将触及 1.2 亿智能终端。

为拓展海外商机,虚拟运营商还积极

“走出去”实施资本并购。不久前,国内虚拟运营商“分享通信”宣布将斥资 2 亿美元收购尼日利亚电信运营商 GiCell。分享通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志祥称,此次收购的目的,不是简单建基站发展用户,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输出。

作为国内移动通信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引入民间资本的有益探索,虚拟运营商最近两年获得飞速发展。截至 2016 年 5 月底,虚拟运营商发展的国内用户数已达到 3100 万。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内虚拟运营商行业整体仍处于亏损境地,各家企业都在“贴钱”抢用户,寻求盈利模式。

在此背景下,利润空间相对较高的国际业务被各大虚拟运营商寄予厚望。专家认为,目前,虚拟运营商正在国际业务方面崭

露头角,这也使得国际业务产业链被全面激活。

在业界看来,国际业务为国内虚拟运营商开辟了第二战场,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随着国内消费者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未来走出国门的机会将会更多,而通信消费已经成为刚需。因此,虚拟运营商谁能够掌握国际业务便能掌握主动权,引领产业发展。

当然,对各大虚拟运营商来说,拓展国际业务也并非易事,需要企业具备足够的海外运营商、渠道等资源整合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另外,针对出境人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也在推出一系列超值优惠套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虚拟运营商国际业务带来挑战。



员工持股改革试点 近期将“破冰”

中央一级企业暂不试点

作为国企改革的重头戏,涉及员工持股等内容的改革也开始破冰。记者日前获悉,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透露出员工持股的改革尝试,以实现混合所有制为旗帜和目标,多地都在制定改革方案并明确提出探索员工持股是国企改革方案中的重点内容之一。除此之外,中央层面也在积极推进改革,目前国资委制定了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报有关部门审批。

“首批试点拟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选择少量企业开展。”一位国资人士对记者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十项试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于地方和央企的员工持股试点正在积极筛选中,多个地方和央企也都在积极筹备并开始进行改革,对员工持股有了积极尝试和推进。他表示,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前提下,将从试点企业类型、出资方式、定价机制、动态调整机制、股权管理方式、持股方式等不同角度探索员工持股的有效模式,开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的对象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优先支持科技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中央一级企业暂不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今年计划在中央企业层面选择 10 户子企业,指导各省市分别选择 10 户企业开展试点,并可视情况适时扩大试点。”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地方已经开始透露出员工持股的改革尝试。

另一方面,地方也在积极推进员工持股改革。记者从多个省份获悉,全国陆续有 28 个省市(区)出台了地方版的国企改革方案,不少地方版方案也都明确提出,探索实行员工持股是各地国企改革方案中的重点内容之一。福建省在今年 3 月出台的国企改革实施意见中提到,“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新兴产业型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实行同股同权。”广东省早在 2014 年就选择了 50 家企业作为改革试点,并在持股比例方面确定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 20%,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 5%,其中专营性、平台性的试点企业暂不实施,与国有股东关联交易占其主营业务收入 80%以上的暂不实施。

而这仅仅是几个例子。据上市公司数据发布机构同花顺的数据,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截至 7 月 5 日,总计有 69 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布了员工持股计划,其中已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有 9 家,已经得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 47 家,已经形成董事会预案的有 9 家,此外还有 4 家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终止实施。

众所周知,员工持股试点和国资证券化,是深化国企改革十项任务中最具挑战性的两块硬骨头。其中,又以员工持股最为敏感。记者了解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国企改革前后经历过两轮员工持股试点,最终均因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发社会舆论强烈不满而被中央踩了刹车。不少专家表示,员工持股要注意是否会带来资产评估黑洞过大,国有资产流失失控,或是管理层占大股,少数人轻易实现对国企的实际控制,或是对外搞利益输送,外部人员尤其是相关官员购买“职工内部股”或“原始股”,等上市后再溢价转让,或者股权激励变成“大锅饭”,反而遏制了企业的良性发展。

“国企现实生存环境,国资数量与质量等外部环境,以及此项试点面临的市场条件,与前两轮员工持股试点已经发生巨大不同。”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下半年是我国员工持股改革的关键时期,员工持股改革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这也给我们下一步国资改革员工持股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相对透明的公示制度以及较强的监督约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此同时,员工持股需要注意底线,不能搞全民持股,员工持股应设立负面清单,明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比如增量优先,科技企业优先,不同类型的企业,员工能持股的比例也需划分,此外,持股也要程序化、公开化。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杨涛)

专家学者把脉中国经济:新力量崛起对冲下行压力

■ 陈凯茵

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已然过半,经济数据“半年报”也即将出炉,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于中国经济。

权威人士在定调“L”型经济增长路线后,应以怎样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当前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勉力推进?专家学者贡献多样视角把脉中国经济。

正视下行原因 以新经济视角看增长潜力

向外看,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6 月 7 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从 1 月的 2.9%调降至 2.4%。报告预测,2016 年,发达经济体增长 1.7%,低于 1 月份 2.2%的预测值。其中,美国经济增长下调 0.8 个百分点至 1.9%,欧元区经济增长下调至 1.6%。

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巴苏表示,金融危机结束已有 7 年时间,但全球经济仍受困于低速增长,而且下行风险明显上升,诸多风险因素让经济复苏举步维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肯定会受到世界经济形势持续的影响,而发达国家经济尚未复苏,需求疲弱,直接影响到我国外贸形势。

向内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依然存在,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人口红利消失、国内消费外流……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认为,这两年经济下行的最核心原因之一是“人口”。

“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主力人口(22-44 岁人口)比例的收缩使得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还发生了产业挤出性向外转移的现象。“中国的传统工业化突然结束了。”周天勇总结道。

此外,周天勇还指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高成本”问题同样是经济下行的不良“推手”之一,交通、利息、税费成本高企,企业负担很重。

服务贸易的逆差也是不可忽视的“拖累”因素,根据周天勇的测算,2015 年出入境



旅游贸易逆差高达 1744 亿美元,教育服务贸易的逆差则在 1200 亿美元左右。这说明旅游、教育、购物、医疗健康养老等消费正向外流出,“成为国民经济增速很强的下拽力量。”

经济下行压力虽大,但近年来一股对冲的力量正在兴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白津夫指出,这股新力量就是“新经济”。

据发改委披露,2015 年中国信息经济的规模超过了 18 万亿。而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6》显示,2015 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 19560 亿元。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 40%左右,到 2020 年分享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将达到 10%以上。

白津夫表示:“新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是溢出的,如果把这部分加入到中国经济的统计或者是认知中,中国经济的增速不会是现在这个数字。应该用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充满信心地来看待当前中国经济。”

多层次“抓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那么,当下的经济形势,哪些“抓手”需要牢牢握住,保持经济增长动力?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林毅夫认为,投资领域仍有很多可发力的地方。他指出,目前过剩的产能一般集中在中低端。我国每年进口制造业所需的产品达 1.3 万亿美元,其中包含众多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端产品,这说明高端产能亟需升级,正等着大笔资金进入。

另外,基础设施也有继续完善的空间。林毅夫分析称,我国目前密集投资投资的基础设施更多是连接城市和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高铁、机场和港口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下管道、地铁等严重不足。环境治理、提升城镇化水平也会给投资带来很多机会。

“实际上,抓住这些投资机会是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的措施。”林毅夫说,“如果我们在补短板的同时,再配上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其

他方面的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樊纲关注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所在。他分析认为,需求侧的政策往往很容易落实,因为“皆大欢喜”。“去产能”“去杠杆”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政策难落实,因为要切实地“损害”到其中一方或多方的利益。利益冲突是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推行和落地过程中,需要考虑打破利益均衡状态,合理运用利益补偿。

周天勇表示,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必须要切实做到让中小企业“有利可图”;政府要适度“让利”给企业首先就得“减税降费”。“不减税降费,放出去的‘水’看到制造业无利可图,将会大量流入到房地产业。一定要减税、降费、把贷款利率降下来,否则实体经济难以运转”。

“其次是开放新的经济领域”,今年 1-5 月中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3.9%,增速不及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针对这一问题,周天勇强调,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包括从前单由国家投入资金的领域也应向民间资本开放。

三家农企“激活”农村土地 ——黑龙江省桦川县规模经营调查

■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孙英威 齐泓鑫

龙江七月,大美稻海,蛙声一片。

记者近日在“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诞生地——黑龙江省桦川县采访了解到,当地农民在经历了从集体农庄到联产承包变革后,如今再度走上土地规模经营之路。目前,全县三分之二耕地实现了经营权流转,其中有 3 户涉农企业更是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通过合作种植等方式经营规模达全县耕地的三分之一。

从第一个集体农庄到“新峰现象”

走进以水田种植为主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桦川县,映入眼帘的就是公路两旁连片的水稻育种基地。1951 年,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的 36 户农户率先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星火农庄,通过集中耕作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

走进星火朝鲜族乡星火村的陈列室,里面摆满了“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曾经的荣耀。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里的土地规模经营热潮再度兴起。

桦川县农业局局长孙立新说,在一大批涉农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全县 210 万

亩耕地中流转量达到 140 万亩。其中,新峰、农丰、金丰 3 户涉农企业自营、委托、合作种植面积就有 74 万亩。新峰集团去年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2 分钱收购合作农户的水稻,带动农户直接增收 800 多万元。

在大片耕地流转种植的同时,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星火朝鲜族乡 4000 多名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奔赴国内沿海地区和韩国、日本务工。乡党委书记南楠说,农户除了土地流转收入外,带地入股还有分红收入,而外出务工又挣一份钱。

创新“企保农贷”实现多方共赢

贷款难是种植大户以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桦川县,涉农企业开创的“企保农贷”等金融创新产品,有效解决了农户贷款难。

作为桦川县土地经营规模最大企业的新峰集团,2011 年首次与哈尔滨银行融兴村镇银行合作,企业提供担保、农民使用贷款,当年发放贷款 7000 万元。几年来,“企保农贷”规模逐年增加。今年,新峰集团辐射的 5100 多户农民获得贷款 4.1 亿元;2014 年开始做“企保农贷”的农丰集团,今年也组织了 2.1 亿元贷款。两家涉农企业组织的贷款量占全县农业贷款的近一半。

在创业乡谷大村,种植 900 亩水稻的幸福家庭农场女主人张飞燕对记者说:“我家一年生产需要资金 100 多万元。好在可以用土地经营权做抵押,今年贷款了 70 多万元,包地、种地的钱就都有着落了。”

“‘企保农贷’开展 5 年一笔不良记录都没有。集团 72 家直营店都在村里,他们既是经销商也是种植大户,农民种什么品种、地块在哪儿,我们都了解,所以才敢给农户做担保贷款。即使贷款农户发生逾期,集团代偿贷款后,把农户土地经营权拿过来也可以自己种。”新峰农业发展集团董事长文景刚道出了“企保农贷”快速发展的奥秘。

桦川县委书记郭广福介绍,全县除“企保农贷”外,还有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农户动产抵押、粮食预期收益抵押、粮食补贴放大 10 倍抵押 5 种金融创新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方便了农户,也“搞活”农村金融市场。目前,桦川县涉农贷款金融机构已由农村信用联社 1 家发展到 7 家,另有 3 家正在洽谈。

“旱改水”稳农民收益也存隐忧

记者在桦川县采访发现,受玉米退出临储收购和市场价格因素影响,今年当地主动

调整种植结构以稳定农民种粮收益。

据桦川县干部介绍,今年全县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提出了“旱田改水田,粮食作物改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改饲料作物,增加绿色有机作物”的目标,计划新增“旱改水”面积 10.5 万亩。与此同时,周边县市“旱改水”面积也在增加。

部分基层干部和企业人士表示,受比较价格影响,黑龙江省水稻种植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这一变化令相关人士感到担忧——水稻市场价格或因大量种植而下降,或因政策性收储而继续保持“稻强米弱”,前者影响农民收入,后者影响加工企业收益。

新峰集团下属的一家大米加工企业负责人表示,这几年一直是“稻强米弱”格局,水稻价格稳定,大米价格则不高,企业加工 1 吨大米约赔 100 元。“过去是想方设法发展客户,现在是一接客户电话就紧张,怕人家要货。”

桦川县工信局局长周文鲁说,全县水稻加工登记企业 68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6 家。近两年,这些企业的实际加工量仅占其加工能力的 20%左右。目前,当地正通过增加优质水稻种植、互联网营销、产加销全产业链经营等方式,推动粮食既“种得好”又“卖得好”,实现粮食稳产与农民增收“双赢”。